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九編 19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 與文學作品研究(下)

林建廷・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九 編

第 19 冊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下）

林建廷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下）／林建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4+15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編；第 19 冊）

ISBN 978-986-404-487-0（精裝）

1. 王開運 2. 社會運動 3. 臺灣文學 4. 文學評論

733.08

105001817

ISBN-978-986-404-487-0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404-487-0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下）

作 者 林建廷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422844 字

定 價 九編 24 冊（精裝）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臺南士紳王開運社會活動與文學作品研究（下）

林建廷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4
第二節 文獻回顧	6
一、各版作品集	7
二、相關資料	9
三、相關論述	11
第三節 進行方式與章節架構說明	13
一、進行方式	13
二、章節架構說明	17
第二章 王開運的家世背景及生平歷程	25
第一節 王氏家族的發展	26
一、家族發展軌跡概述	26
二、父親王棟的生平	30
第二節 青年王開運的求學時代	36
第三節 就職與創業	44
一、大社公學校訓導	44

二、臺南市役所西區役場書記	47
三、任職臺灣銀行臺南支店	51
四、大東信託臺南支店代理	55
五、轉向多元發展	60
六、以第一銀行爲主的戰後事業	64
小 結	69
第三章 邁向地方士紳之途（上）——臺南商工業協會的活動	73
第一節 促進商業繁榮	74
一、臺南商工業協會的成立	74
二、參與「廉賣會」與「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	76
第二節 改善經商環境	92
第三節 啓發商工智能	108
一、商工考察活動	108
二、成立「共榮貯金會」	114
小 結	115
第四章 邁向地方士紳之途（下）——由商務向外延伸至其他地方活動	119
第一節 加入臺南王姓宗親會與協調南門墓地事件	119
一、臺南王姓宗親會	119
二、南門墓地事件	123
第二節 接觸民族運動	130
一、美臺團	132
二、臺灣地方自治同盟	136
第三節 擔任市協議會議員、路竹庄長與市會議員	144
一、市協議會議員、市會議員	144
二、兼任路竹庄長	152
第四節 推動民間社會事業「臺南愛護會」	154
一、成立背景與籌備過程	154
二、營運狀況	159
小 結	173

中 冊

第五章 海南島經歷與戰後際遇·····	179
第一節 海南島經歷·····	180
一、前往海南島·····	180
二、爲返家鄉的奔走·····	186
三、離瓊後持續參與救援·····	197
第二節 戰後際遇·····	208
一、捲入二二八事件·····	208
二、加入「臺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	215
三、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議員·····	222
(一) 地方發展·····	224
(二) 交通·····	231
(三) 公營事業·····	235
小 結·····	240
第六章 文學活動的外部考述·····	243
第一節 漢學素養的來源與應用·····	244
第二節 文學活動與社團的參與·····	252
一、吟詠於詩社之外·····	252
二、擔任《三六九小報》編輯·····	255
三、擔任《臺灣詩壇》副社長·····	262
第三節 文學交遊·····	267
一、黃拱五·····	267
二、王亞南·····	273
三、陳逢源·····	278
四、王鵬程·····	283
五、蔡朝聘·····	287
小 結·····	291
第七章 王開運詩文作品析探·····	295
第一節 漢詩作品的主題·····	295
一、詩作概況·····	295
二、對於功成名就的繫懷·····	298
三、對於時局、生命的憂思·····	304
(一) 日治時期·····	304

(二) 戰後·····	313
四、島外旅途所感：以中國經歷為例·····	320
五、用世與歸隱的選擇·····	330
第二節 雜文作品的書寫主題·····	339
一、雜文作品概述·····	339
二、對於傳統漢學的擔憂與振興·····	342
三、對於習俗的反省·····	347
四、對於品德低落的針砭·····	353
五、中庸而入世的個人處世觀·····	359
小 結·····	365

下 冊

第八章 結 論·····	369
王開運生平簡表·····	381
參考書目·····	411
附 錄·····	423
附錄一：文獻資料圖錄·····	425
附錄二：王開運四子駿嶽先生訪談·····	453
附錄三：王開運作品補遺目錄·····	461
附錄四：他人致贈王開運之作品目錄·····	465
附錄五：王開運藏書單·····	473
附錄六：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一屆期間（1951～ 1954）王開運問政紀錄目錄·····	483
附錄七：《王開運全集·詩詞卷》補充與修定·····	497

第八章 結 論

人物研究看似不難，要深入其實並不容易。人與事是互相關連的，研究人物就不能不研究他涉及的事件，事件的發生又有其時代脈絡，如果時間與資料充足，一部人物傳記也能寫出大歷史。

——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註1〕

由個別人物銜接至整個時代環境的「見微知著」視角，說明了口述訪談、回憶錄、傳記之存在必要。這在領導階層人物的個案考察上尤為適用，畢竟領導階層的影響力、參與或見證歷史發展的機會，大致上還是比一般人來得明顯，「有助於我們瞭解台灣的長期發展軌跡〔註2〕」。職是之故，研究王開運的重要性亦在焉。

本論文乃較全面而周延地考述臺南士紳王開運的生平歷程。由於此前少有完整或深入的研究成果，故筆者以文獻資料為主，田野調查為輔，透過研究王氏的社會活動、文學作品，來嘗試觀察王氏於臺灣近代史上的意義、地位；換句話說，筆者著重建構工程，期望能夠掌握王氏與時代環境的互動情況，以及作品內容的精神面貌。另外，因為撰文需要，加上蒐集資料略有所得，本論文遂向上推及王開運家族的發展軌跡，向下延展至王氏的戰前、戰後際遇；同時，關乎臺灣文史的事件，例如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安平築港運動、王姓宗親會、南門墓地事件、美臺團始末、臺南愛護會等，亦一併說明。而實際撰文，則區分為「家世生平」、「社會活動」、「文學活動」3部份

〔註1〕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頁2。

〔註2〕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1893～1982）》，頁2。

來進行。

王開運家族是較早紮根於高雄市路竹區的王姓家族，其開基祖為王文醫，隨鄭成功渡臺，清領之後便在路竹區的一甲等地進行拓墾，稱為「白礁王」；加上後續渡臺的田頭王、鬼仔王、豆腐王等 3 支也聚居一甲，更添宗族勢力，成為地方大姓。到了王開運的父親王棟，是「白礁王」來臺第八代，王棟和其兄弟王城，以及王棟長子道宗，都具備生員（秀才）功名，使得王家晉身為地方上的領導階層。這也說明了，家族在地方上先能夠紮根，後代才有繼續向外發展的基礎，一如林慧姪研究吳新榮生平思想之時，所提出的「巨人肩膀上」的分工觀點。而王棟對幼子王開運的影響，亦復如此。

王開運所站立的巨人肩膀，來自家族，更來自於父親王棟。王棟於 1893 年登第成為生員，旋即遇上乙未割臺，成為遺儒，時王開運只有 7 歲；而由於在臺政權遞變，社會領導階層各有抵抗、歸隱、逃遁、接受等不同的肆應方式，引起階層內部流動，王棟因此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籠絡，掌理一甲地區十數年，頗有治績。其長子道宗、三子開泰也先後掌理過一甲，1930 年代王開運更回鄉擔任路竹庄長，可見從明鄭、清領到日治，王家在地方上紮根漸深，其聲望不見衰落。是以，面對世變，一開始是由王棟帶領家族肆應於新局勢，維持家族聲望，並在漢學素養、新式教育、卜居等 3 方面對王開運產生深遠影響。

王開運自幼由父親傳授漢學，成長後又能自修傳統文學，故漢學根柢厚實，為詩人、作家。王氏也被送入公學校、國語學校，吸收新教育，並接受父親建議，移居臺南；如此，則擁有了日後成為臺南士紳的契機。新教育是日治時期成為新一代知識份子、士紳的普遍條件，而臺南與路竹有地利之便，又是南部大都市，且王開運卜居之處「柱仔行」更是鄰近臺南政經、文教、交通的中心，方便與形形色色的人物往來交流，這些優勢都能夠助長個人事業與名位的發展。進一步說，王開運成為士紳的天時、地利、人和等要素，都因之而具備雛型，所以王棟的影響委實深遠。

扣除王開運從國語學校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大社公學校的訓導之外，1915 年起，王氏即遷居臺南，並在此謀職、創業投資。日治時期，王開運在臺南經歷了西區區役場書記、臺銀臺南支店書記、大東信託臺南支店代理，到了 1930 年代以迄 1944 年，則轉向多元經營，如南郡運輸、永森記商行、貸地業、潮州合同運送、臺南薪炭商組合、永茂紀商行等。筆者考述這些工

作經歷，不單只是說明王開運從事過哪些職業，更從中觀察到，其戰前、戰後的事業大多與金融、商務（運輸、貨物集散與批發）相關，遂使得王氏具備商人身份，得以加入日治時期的臺南商工業協會，同時有助於人脈網絡的經營（即「人和」這一項要素）；也正是在這些背景之下，王氏步向臺南士紳之途。於是乎，隨著在臺南生活漸久，王開運的工作表現與才能備受肯定，人脈經營產生作用，遂於 1927 年臺南商工業協會成立之初，王氏即被推舉為會長；且因領導有方，得以久任不替，直至 1941 年商協解散為止。

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思潮轉變、經濟不景氣、臺銀破產危機（1927），以及殖民者的民族差別待遇、商人欲保護各自利益等因素，促使臺籍商人紛紛成立商工團體，臺南商協正趕上這波潮流。再者，處於被殖民的時空下，臺灣的商工團體大多扮演著官民之間的橋樑，以比較溫和的方式替民間發聲，故成為地方上新興的領導力量；而臺南商協也確實發揮了創造利潤、改善經商環境、爭取地方建設、為地方溝通請命等功能。因此，這使得臺南商協成為重要團體，與日籍商人組織的「臺南商工組合」、「臺南實業協和會」，在市內鼎足三分。

臺南商協在王開運的領導下，「創造利潤」方面，經常與其他商工團體、臺南市役所合力舉辦「廉賣會」，對於帶動消費、改善商況有不少貢獻。其中蔚為盛況者，為 1930 年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是當時臺灣島內前所未有，也遠勝於日本內地過去的史料展覽；而王氏則自始至終參與紀念會的籌備與執行，擔任紀念會的評議員、活動寫真係長，與官紳群策群力地將紀念會塑造成全臺性的重大行事。在「改善經商環境」方面，臺南商協與王開運曾經奔走於店家的業務、財務問題，並維護店員、勞工的權益；就中與大阪商船交涉運費調降，也可見王氏不負商家期望，此事遂讓臺南商協一戰成名，使得臺南商協成為商民優先考慮陳情的管道之一。自 1928 年起，王開運又投入「安平築港運動」，1930 年成為市內臺灣人的代表，與日人官紳共赴日本，爭取全國港灣大會對「安平築港運動」的支持，終於促使殖民當局於 1935 年動工築造新港口。至於「啓發商工智能」方面，乃是臺南商協對內培植鞏固自身實力之用。一者是成立「共榮貯金會」，協助商協成員的借貸、還款事務，且營運得當。二者是進行「商工考察」，助長商協成員拓展視野，而王氏〈東遊日記〉，是臺南商協僅存的商工考察報告，也是戰前商工團體的重要史料。凡此種種，皆證明王開運領導有方，以致於能夠連任會長，並讓臺南商

協成爲地方上重要團體；且王氏能兼顧臺灣商人的利益與爲民請命，顯然自己清楚自身的角色定位。

加入臺南商協，是王開運成爲臺南士紳的開始，而置身於領導地位，讓臺南商協成爲官民之間的橋樑，則王氏也因此擁有更多的機會來經營人脈、參與其他社會活動。在「宗親事務」方面，王開運與王汝禎等人於 1928 年成立了「王姓宗親會」，扶持同姓宗族，也落實社會事業，是日治時期南臺灣的一大團體；王開運與宗親會的關係相當密切，處於核心位置，這表示其透過宗親關係，更在臺南市緊實紮根。同年發生的「南門墓地事件」，王開運則代表臺南商協，並帶著王姓宗親會成員的身份，向官方陳情大運動場計畫應當停止，其熱切態度與犀利言辭，突顯了殖民當局的固執蠻橫；加上其他宗親會、臺灣民眾黨、新文協、共勵會等諸多團體也競相陳情抗議，終於迫使官方暫停建造計畫。對此，報端稱之爲臺灣人在政治上、地方上的大眾運動的最初勝利。而王氏也就在同一年被籠絡爲官選市協議員，說明其不再只是一介商人，還是官方不宜輕忽的地方人物。

「民族運動」方面，王開運的紀錄較不明顯，卻時有同學蔡培火相伴左右，筆者乃一併述及王、蔡二人的往來情況。兩人自國語學校畢業，因任教地點相近，故有來往；之後蔡培火赴日本深造，從事民族運動，王開運也曾寄稿給蔡氏。待蔡培火返臺，任臺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文協本部遷至臺南，兩人恢復聯繫，例如王開運曾爲文協讀報社演講；1928 年則受蔡氏之邀，共同成立「美臺團」。嗣後，王、蔡二人一同投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蔡氏更囑意王氏修飾自聯趣旨書；又，1931 年，蔡氏仍有意招覽王氏擔任《臺灣新民報》的支局長。此外，蔡氏的個人私事也有王氏相助，足見二人交誼之深。就中，王開運的參與程度較爲積極者，是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這固然有著與蔡培火的交情之因素，而自聯廣納認同者的包容性、王氏自身的協議員經驗，也有著關聯。總之，從這些斷斷續續的相關紀錄來看，王開運或許未曾熱切響應民族運動，但不代表其反對；特別是參與自聯一事，王氏始終定著於自聯臺南支部，一定程度地說明了其認同地方自治之理念。

「政治」方面，王開運總共擔任了 16 年的市協議員與市會議員，期間兼任路竹庄長，是值得探究的面向。從僅存的文獻可發現，王開運常以多元身份奔波於地方事務，例如安平築港運動，以議員身份在議會內參與討論，對外則以臺南商協會長、地方士紳的身份進行請願。其他如貧民救濟、失業救

濟、增稅、市區改正、運河使用費等事項，亦是如此，在議會之外或是以臺南商協會長，或是以臺南愛護會副會長的身份去奔走。再者，王開運幾度獲選為議會的參事會成員，擔任過議會代表，出席全臺的議員協議會，加上連任十數年議員，可知王氏與地方政治的關係相當緊密。至於外界評價，從為民喉舌的《臺灣新民報》所自辦的「模擬選舉」，可證明王開運是民選議員的適當人選，具有民意聲望；該報社自編的《臺灣人士鑑》，二度將王氏收錄其中，即肯定其士紳地位；甚至立場親日的《臺灣經世新報》，更譽之為「神都守護者」，表示得到日人青睞；這些都說明王氏的社會評價頗佳。而王開運兼任路竹庄長，主要表現是在調和庄內的派系糾紛，且之前其父兄就是路竹地區的一甲區長，因此子承父業，足見王家聲勢在路竹歷久未衰。

「社會事業」方面，由臺南商協所設立的「臺南愛護會」，是日治時期臺灣南北兩大專責乞丐收容的民間社會事業，其間王開運所扮演的角色不可輕忽。透過對於愛護會成立始末、營運過程的考述，可以發現愛護會一直由臺南商協支持，前者事務是後者會議裡的重要議題，兩個團體的成員也多有重疊，王汝禎、王開運則長年擔任愛護會的正、副會長，王開運更為了籌備愛護會而四方奔走。其次，愛護會繼承了施乾的臺北愛愛寮之理念，擔負沉重的乞丐收容工作，有效解決的市內乞丐問題，其貢獻不遜於重點擺在一時救濟的臺南慈惠院（官方體系），也得到社會佳譽。但相較於愛愛寮，愛護會的營運狀況相對穩定，逐年擴增規模，因此使得施乾期待愛愛寮同樣能夠以團體模式經營，計畫將愛愛寮「財團法人化」，這不無效仿愛護會的意味。

「文化」方面，1930年，王開運與文友創辦了《三六九小報》，這是日治時期臺灣人所經營的文藝雜誌之中，少數能長期經營者，並具有維繫漢文、抵殖民的作用，在臺灣文學史裡具有重要意義。王氏初始就是創辦人之一，此後仍是核心成員，這可以從同人名單來觀察，也可以對比《小報》成員與「臺南商工業協會」成員的重疊性來得到印證。為了捍衛《小報》，王開運也曾與《臺南新報》或其他反對者進行辯論筆戰；而《小報》之所以在「臺北愛愛寮」設置取次所，向北部市場推廣，也是因為王開運身兼「臺南愛護會」副會長，在社會事業上與施乾有所交集，二人結為朋友的緣故。創作數量上，王開運的〈釋三六九小報〉是《小報》創刊時唯二的宣言，並且有大量雜文作品刊登在《小報》，所刊登的期數佔總期數一半以上。凡此種種，可見王氏對《小報》的熱情付出。

積極參與《三六九小報》，進一步反映了王開運愛好傳統文學，以及欲透過刊物來關懷、介入社會的心思。由於家學影響，王開運在國語學校時期已能賦詩，其讀書傾向、藏書清單，亦以漢文古籍為主，甚至旅行日本，還特地前往東京知名的漢文書店「求文堂」參觀。這同時說明了其漢學自修途徑從何而來，且藏書更是創作時的參考來源，在散文作品裡頭，有不少地方即是引用讀書摘錄。是以，《小報》的出現，正好提供王氏一個可資寫作發揮的空間。

王開運畢生的散文創作，主要都刊登在《小報》，而此時期也是王氏事業有成、具地方聲望、社會活動頻繁、性格成熟穩重的時候；因此，欲知悉其如何透過刊物來關懷社會，《小報》的雜文足具代表性。總的來說，王開運的雜文主題有四，其一是擔憂傳統漢學衰微，並提出振興之方；王氏根據學習經驗，主張不能只依靠學校體系，學子要勤加自習，父兄從旁督導，王氏還在雜文裡，以比較輕鬆的方式，向讀者說明漢文的價值與美感。其二，是反省習俗，王開運相當在意民眾過於迷信，導致浪費錢財，智識愚弱，故 1920 年代就撰文批評，戰後猶在詩作裡提及，目的即欲改去陋習，提升民智。其三，則是針砭品德低落的問題，特別是富戶者、士紳、知識份子，更是汲營名利，忘卻社會責任。乍看之下，王開運似乎在追求回復傳統美德，然而筆者認為，王氏用意更在於企望臺灣人團結，齊同進步向上，守護民族尊嚴。

其四，王開運也藉著雜文來表達自己的人生觀、性情與個人修養工夫。從中可知王氏素有經世濟民之志，卻自稱缺乏鬥性；這是個人性格，更是肆應於殖民時代的姿態，不欲爭的，是無謂的糾紛，理應爭取者，則迂迴奔波。而為了兼顧用世情志，培養自身元氣，並免於受挫灰心，王開運乃強調忍耐、不執著、安貧樂道的修養工夫，這些都有自勉又勵人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同時代的文人蕭永東認為雜文有如下優點：

隨筆及隨感錄，皆是無閒工夫的人所著的斷片文章，總是文簡意長，隻語片言，可以斷一事評一物，就其時的感想事實或理論，實實在在，描寫出來，而其裨益的所在，比長篇文較速而且不忘。〔註3〕

這般評語，恰好佐證王開運的雜文亦莊亦諧，卻有其深意，且篇幅短小，也使讀者感到輕鬆痛快，這正是《小報》風格。到了戰後，雖然《小報》早已廢刊（1935），王氏的議事精神卻復現於臨時省議會的議壇之中。

〔註3〕古圓〈想著就錄〉，《三六九小報》124（1931年11月3日）。

此外，王開運更自許爲詩人，終生創作，日治時期的人物志書亦以詩家目之。鑒於當時傳統詩社林立，作詩活動容易淪入恃才競勝等忽略「詩言志」本質的情況，因此王氏不僅認同連雅堂、陳逢源的漢詩改革理念，自身也甚少參加詩社活動，且作詩偏重閒詠詩，這樣的堅持亦延續到戰後。至於整體詩作內容，則散發出濃厚的愁緒，而這些愁緒對照王氏的生平歷程，各有不同的指涉與緣由。

其一，是「對於功成名就的繫懷」，這表現出王開運在青年之時，有著年輕、血氣方剛，及患得患失的一面。其二，是「對時局、生命的憂思」，出現在 1930 年代之後。此時王氏的歷練與視野已有所累積，故時局變化、年歲增長、病痛，社會活動的順逆、事業經營的盈虧等，都可成爲詩作元素；連帶的，詩境亦因而更加開闊，既有同時代有識者的共同心聲，又展現了個人特殊情感。到了 1940 年前後，由於面臨中日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王開運的詩作又多了一項元素，亦即頻繁地反映出對於年歲、時節的敏感與警覺，並傾吐時光匆促、一生無成、繁華如夢、時局變幻莫測的無奈。戰後，由於臺灣局勢仍未安然，這種對於時局、生命的憂思也就未曾消失，惟感嘆的對象或原因有所不同。而王開運開始明顯憂思生命、時局的時間點，恰好與《三六九小報》的存續時間有所重疊，可知其詩與文之間有相輔相承的作用，一者承載心聲，一者關懷時代、社會之問題。

王開運詩作愁緒的第三個緣由，在於旅途所感；特別是連續於 1939 年、1940 年前往中國經歷，有著故國情懷與世事無常的感受，並從中譴責戰爭。之所以那麼強調「無常」，一者是不容明言反對戰爭，故以恆常、變易對比，藉以透露內心情意；二者，乃因時局變動不易掌握，其處身亂世，感受更加深刻，無形中強化了人生虛幻的認定。

最後一個愁緒緣由，則是擺盪於用世與歸隱之間。自中年以後，由於時代動蕩、際遇多舛、家庭重擔、自覺年老等因素，王開運內心常是「憂思」、「用世」、「歸隱」並存。當意欲用世，卻無法力挽狂瀾，且家計纏身又思及年老；意欲歸隱，則局勢不允，家計仍要考量，而自己也憂世感時；若專務家計，則遺憾不能安度晚年，也不甘心庸碌度日；如此多的外在羈絆與內心矛盾，終造成其用世不能、歸隱不得的窘境。

至於文友方面，王開運較頻繁地與之賦詩唱和者計有 5 人。黃拱五和王開運是舅甥關係，但也情同兄弟，彼此詩作透露出關愛與敬仰。王亞南是中

國畫家，王開運與之結為至交；二人時常交談當時的中國情勢，並勾起王開運的故國情懷，與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身世之慨。陳逢源與王開運齊同吐露對於時局的感嘆，相互慰勉；且陳逢源面對文友逝世，少有悼念作品，惟王開運是少數例外，可見日後陳氏萬般痛惜王氏的逝世。王鵬程投筆從商，常需往返日本、臺灣以貿易，王開運則不因距離遙遠而減少與之唱酬。蔡朝聘可能是最能夠與王開運談心的，二人互訴人生感悟、對於時勢的不滿，還關慰對方的生活狀況與身體健康。整體來說，這 5 位文友，除了王亞南來自中國且早逝之外，其餘 4 人皆與王開運有地緣關係，也間接證明王氏在臺南的活動確實最為活躍。

要之，王開運以臺南商工業協會為始，漸次涉及其他社會活動，因而鞏固了其臺南士紳的地位，王氏也清楚身為領導階層的角色使命，戮力於公眾事務，專致於地方發展。然則，在考述王開運事跡的同時，也須注意到局勢、政權、時代對於個人的強大影響力。1920 年代興起的臺灣民族運動，隨著殖民當局的強烈打壓，至 1930 年代已漸趨沒落；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淪為殖民地的臺灣，更不可避免地被推入戰時體制，布滿一言堂之氛圍。是以，王開運參與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於 1937 年解散，其長年領導的臺南商協，也不得不於 1941 年解散，失卻了一個重要的活動舞臺，剩下的社會活動只有宗親事務（王姓宗親會）、社會事業（愛護會）與政治（地方議員）。

從這情況來看，一方面可知王開運在社會上較為頻繁的活動紀錄，確實集中在 1930 年前後。二方面，說明了若干活動領域或是官方得以操控者（如政治），或是性質較為溫和，不易與官方抵觸，所以得以存留的機會較大。也因如此，王氏在各領域的發揮空間便有所不同，其顯著表現，在於商務、社會事業、宗親會、文化等；民族運動則本身即容易受挫，王氏在這方面的活動也較不活躍。政治方面，地方自治制度本身不健全，王開運的議政空間不大，戰爭期間更加強了種種鉗制，只能附和，難以反對，故在零星資料裡頭，也會發現王氏有配合戰時的言論舉止。事實上，恐怕是不得已、被迫的意味居多，這從王開運的詩作裡，便能推敲出無奈又擔憂時局的心情；因此，王氏看似連任議員十數年，政治上卻未必有影響力，其真正的活動舞台乃是在政治之外。

1944 年，時值戰爭期間，王開運受臺灣銀行推薦，遠赴海南島擔任瓊崖銀行的總經理，但其實是被推入戰爭協力者的窘境，加上路途遙遠，海南島

局勢不安定，王氏委實不願意，卻無法推辭。

在海南島滿一年左右，王開運便遇到戰爭結束，這竟是另一波苦難的開始。戰後國民政府握有資源，隨即投入國共內戰，幾經折衝，才將留瓊臺灣人接送返鄉；其間，留瓊者付出了重大代價，返臺時程最晚，途中遭遇異常艱辛。當時王開運擔任「旅瓊臺灣同鄉會」會長，爲了協助臺灣人早日返鄉，更不顧身處危難，四處奔走；即便先行返臺，也未曾鬆懈，持續爲臺人返鄉而努力，其貢獻不容忽視。1947年，王開運成爲第一銀行公股監察人，隔天發生二二八事件，王氏也在事件中身陷囹圄。對此，筆者認爲，正是因爲王開運奔走留瓊臺灣人返鄉之事，無形中成爲旅外臺灣人的精神領袖，又政府調查出王氏在戰爭期間，有協助日人的舉動，遂以「擾亂治安」罪名將之逮捕。出獄後，王開運心中的陰影難除，加上高壓的政治氛圍、年紀老大、感慨身世滄桑，以及家計的煎熬、鄉愁（1950年代遷居北上），遂沒有留戀於社會舞台的必要，漸次縮限在自身的事業裡，並以第一銀行爲事業重心；與日治時期相比，其社會活動明顯銳減。

不過，王開運的立場是「中隱」的，藉著不願積極用世，卻可接受閒職的姿態，日後又加入了「臺灣地方自治研究會」，協助地方自治的推動，不但有所貢獻，也見證自治的起步。嗣後，新政府於1950年代落實地方自治，王氏乃參選首屆臨時省議員，對南臺灣的發展、交通、公營事業等議題，多有建言，且參選舉動本身即帶有監督自治施行成效的用意。這般活動事跡，則可聯結到戰前王氏參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長年擔任地方議員的經驗。至於戰後的文學活動，王開運加入了《臺灣詩壇》（1951年創刊），但遲至1955年，才與陳逢源、林熊祥共同擔任副社長；就個人的創作情況來看，詩作數量與活躍程度也都不如戰前。究其原因，仍與上述王氏的戰後社會活動銳減之因素類同。然而，《臺灣詩壇》側重個人閒詠，加上文友力邀，遂讓王開運與之保持聯繫，此後長年名列在該團體的成員名單之中；直到1968年，也就是王氏逝世的前一年，都還可見其爲《臺灣詩壇》徵詩活動的發起人之一。

綜合本論文的考述研究可以發現，一生經歷清國、日本、戰後3個政權轉變的王開運，因擁有「天時」（新教育背景）、「地利」（居住臺南）、「人和」（交遊廣泛）等要素，晉身爲地方士紳的優勢遂水到渠成；加上個人才能、工作表現、從事商職、用世情志等特質，終究能夠經由臺南商工業協會，漸次活躍於商務、社會事業、宗親會、文化、政治、民族運動等領域，並肩負